

历史与出版

《走向世界丛书》出版始末

——再访出版家钟叔河

丁一达



钟叔河。图片来自网络

钟叔河,我国著名出版家、作家、学者,曾任岳麓书社总编辑。上世纪80年代,因主持出版《走向世界丛书》而蜚声中国知识界和出版界,该书记录了19世纪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的早期脚印,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同西方相遇后的最初见证。

在处于改革开放早期的上世纪80年代,丛书无疑给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一个崭新的视角和历史的借鉴。笔者曾有幸多次拜访“念楼”(钟先生书房名),得闻钟先生亲炙。在最近一次访问中,笔者着重向钟先生请教了“走向世界丛书”出版的前后,重新了解了那段充满活力和抱负的出版史,和它背后那个思想解放、万象更新的时代。

老先生年近九十,依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谈兴起来时往往刹不住车。从劳伦斯谈到周作人,从《庄子》谈到《老学庵笔记》。相处既久,知道老人不能久说话,便往往把话题限定起来,以免收摄不住。这次一去,我就先提出了不情之请,希望钟先生能够和我粗略谈谈当年出版“走向世界丛书”的始末。钟老答应了。

1979年,钟叔河先生受一位挚友,著名学者朱正推荐,分配到湖南人民出版社,“那时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中国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未来将往何处去?”

数年后,两人致力的不同出版工作,也可视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朱正参与组织了《鲁迅全集》的编注,开展了大量鲁迅研究,通过鲁迅作品透视旧中国的痼疾;钟叔河则主持“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辑出版,为改革开放中大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提供历史的借鉴。

正是这样的问题意识让钟先生甫一到任,就看准了大量未经印行的晚清游记,包括1840—1911年期间中国人到西方的记述,包括游记、日记、旅行记、回忆录、叙事诗等各种体裁。其作者则涵盖了晚清的诸多名人。这既是钟先生以往的兴趣所在,似乎也是时代的某种召唤。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

大会上的祝辞》中鲜明地提出:“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双百方针”的重新提出,无疑给当时的文化界、出版界带来了新鲜的活力。

在《走向世界丛书总序》中,钟先生一表自己的初衷:中国的现代化还有漫长的艰难历程,我们不能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观察和体会,有些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丛书”早期的编印中,钟叔河先生还同时开展着其他编印工作,“那时候,也没有电脑,只能请人抄录稿子,再一字字校对、标点。每一本都有附上一篇导言,最开始实在是辛苦得很。”

丛书的编撰很快得到了来自前辈学人的肯定。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钱钟书先生对“丛书”出版的支持。

当时年逾八旬的钱钟书先生在得知“丛书”的编辑出版构想后,主动约见钟先生,并主动提出为“丛书”作序。就连杨绛先生也在给钟老的信中直言:“钟书生平主动愿为序作者,唯先生一人耳”。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也称赞丛书是“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

还记得初识钟叔河先生时,他得知我偏好文史哲,便语重心长地引《论语》中的“君子不器”来教导我,指出读书应该不拘一格、博览通观,“文史哲要读,理工方面的书也应该读。我原来就最爱读科技书。”语罢大笑。

我想这样的读书之法,也是钟先生“走向世界”精神的一个脚注。小至读书,大至为国,都应该要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气度。

阅读与写作

走进与走出

——读《汪曾祺的写作课》

何争鸣

近年来汪曾祺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追捧,有人评价出现这一热度是因为,汪曾祺的作品打通了古今、中外、南北、雅俗,现当代五个层面的隔阂。他是如何做到的?我们也许可以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汪曾祺的写作课》一书中一窥端倪。

《汪曾祺的写作课》这本书并不是汪曾祺专门写的培训教程,而是汪先生在不同的时期和场合下发言、讲座等的综合整理,虽然系统性不是太强,各篇之间也有一定的重复,但是我还是从中领悟到写作的真谛,那就是“走进与走出”。

走进读者。“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也就是写作者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责任,歌颂真善美,唤起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只有这种积极向上的,充满阳光与温情的作品才能受到读者的青睐。

走进生活。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是写作的第一要素,所以必须要了解生活,体味生活。当然在写作中,并不能一味地照搬生活,必须要有合理的想象和虚构,“想象和虚构的来源,还是生活。一是生活的积累,二是长时期的对生活的思考。”没有了生活,所谓的想象与虚构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品就不能给读者体验的感受,更不会产生共鸣。

走进作品。“要贴到人物来写”,这是汪曾祺从其师沈从文处学来的金玉良言,也是他多年写作中一直恪守的一项原则。这句话对于小说而言的,推广开来,也就是说写作者要把自己融入作品中,要随着作品情节的起伏一起律动,这样写出的作品才能贴切,才不会有无病呻吟、隔靴搔痒之感。

走进传统。在谈到语言时,汪曾祺认为要想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就必须了解中国文字的特色、研究传统文学的精髓,充分地利用中国音调、对仗等格律形成的美感。这样才能拥有驾驭语言的能力,最终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当然还要走进民间汲取民俗的营养,走进其他作家,找到自己的不足,学到新的写作手法等等。当然走进之外,还要走出。

走出定式。比如成语,我们大多认为它们言简意丰,使用它们可以节省笔墨,让读者可以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认识,但是汪先生认为,“凡属描写,无论写景写人,都不宜用成语。”因为这些定式的东西,易形成僵化、呆板的语境,不能真切地反映出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必然是似是而非,模模糊糊,因而也就是可有可无。”合理运用是可以的,但绝不可形成依赖,“满篇都是成语,容易有市井气,

有伤文体的庄重。”因而必须要摆脱定式,避免形成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千事一理的大众文。

走出约束。汪曾祺在提到结构时,提到“结构的精义是:随便。”也就是有多少文章就应该有多少种结构,即所谓的文无定法。当然,语言也是一样的,没有一种语言格式是通用的,农民有农民的语气,工人有工人的话风,南方有南方人的语感,北方有北方人的腔调等等,也是要根据文章的要求进行运用的。只有依照具体作品的具体要求,随时变换自己的表现形式,才能使文章有独特的魅力。

走出单一。要想写出好的作品,多读书是不二法门。关于读书汪曾祺认为,不要只读一种书,不要只读文学书,要放开眼界,多读杂书。读杂书可以“可以增长知识,认识世界;可以学习语言;可以悟出一些写作道理。”

汪曾祺在小说、散文、戏剧等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汪曾祺的写作课》虽不能囊括其写作技能,但其中的写作观念、技法、经验绝对是难得的瑰宝。



相关链接

《汪曾祺的写作课》

作者:汪曾祺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酷威文化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作家传真

株洲作家张雄文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雪峰山的黎明》,描述的是湖南中西部的一个较为贫困落后地区如何摆脱封闭和落后状态,借助发展文化旅游,进而摆脱贫困的过程,为一个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留下了一份信史。作品主题正如标题,关注的是雪峰山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新生活的“黎明”,这里的群众将摆脱贫困,开启新生活。同时也是对主人公陈黎明回报家乡、反哺故土的生动描述。

这部作品的特点首先表现在,作者将地方脱贫攻坚放在我们国家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书写和叙述。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处于雪峰山深处的溆浦,由于地理环境、自然灾害、遭遇洪水等原因,这里的老百姓原先相当贫困。作品中写到,因为资源匮乏,有些地方的猪养了三年也只有七八十斤,这里的很多山民娶不上老婆,打了光棍;还有很多人不情愿地给别人当了上门女婿。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到湘西十八洞村提出“精准扶贫”的口号后,中国乡村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雪峰山的黎明》笔下的溆浦县通过扶贫、脱贫、致富三步走,带动全体百姓共同致富,彻底甩掉了贫困的帽子。

张雄文注重在历史的坐标上进行考量和思考。书中写到溆浦曾经是屈原流放之地,“入溆浦余怀兮兮”。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最有名的诗句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也正是带着对百姓困苦生活的万般牵挂,他走向汨罗江,投河自尽。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曾于溆浦转战、暂驻,在这里为人民的幸福而搏杀奋斗;抗战中的雪峰山曾是中国正面战场上最后一次会战——湘西会战的地点,中国军队在此浴血奋战。千百年来,仁人志士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让雪峰山区这块热土上的百姓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但是,因为缺劳力、缺资金、缺技术等各种原因,贫困始终困扰着这里。

雪峰山的脱贫,借重于文化旅游开发振兴乡村,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作品中主人公陈黎明的经历也相当曲折。作者详细地描述了他曾经是一位文学青年,写过诗,后来又去参军,当了基建工程兵,复员转业回家,甘愿舍弃外贸经理的职位而下岗,办起了猪场,创业成功后舍弃了上市公司的职位,甘心拿出全部的家底发展雪峰山文化旅游事业,为家乡修路、架桥。老百姓对此甚为不解,称呼他为“哈协主席”,认为他这个人太“哈”太傻了。陈黎明的文学文化情怀和乡土情怀、百姓情怀,都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生动的展示。

作者注重刻画人物,讲述故事,采用前后对比手法,表现文化旅游发展给乡村带来的文明新风和社会变革。作者亲临现场,采访深入细致,注重实证的应用。他的行走深入到民间,因此能够采集到许多丰富的地方性的内容,注重突出作品的文化特色和历史底蕴,尤其是注重发掘当地雪峰山区散落着的古村落、古书院、古桥、古庙、古亭、古牌坊、古驿道、古井、古树、古塔、古祠堂和古战场“十二古”的故事。《雪峰山的黎明》用生动的事例,印证了这样一个真理:贫困的原因各有各的不同,脱贫的路径独特迥异,但是殊途同归,结果和目标只有一个:摆脱贫困,走向小康。雪峰山区的百姓通过发展文化旅游,向文化要效益,向文化要发展,依靠文化作为强劲的精神支撑和底气,深挖稻作文化、饮食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生态文化等,逐步摆脱了贫困。老百姓通过参与景区的建设,日子逐渐过得红红火火,或者参加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或者通过资源入股、产业扶持、产品加工、农业合作社建设等而不断受益。有的农民开办民宿,有的从事景区的品茶、宾馆等服务业,有的担任了环卫工人,有的通过传承花瑶挑花技艺……都从雪峰山的扶贫和文化旅游开发中获益。《雪峰山的黎明》所描述的脱贫经验是独特的,为我国的脱贫攻坚战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印记。

李朝全: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创作室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张雄文: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全委、湖南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株洲市作协副主席。

作家简介

记录小康的可贵地方性收获

——评《雪峰山的黎明》

李朝全



图片来自网络

剧评

从“荒茅”到“花茂”

——观《花繁叶茂》有感

刘洋

近段时间,《山海情》《我的金山银山》《一个都不能少》等扶贫剧的陆续播出,让观众大饱眼福。不过目前最吸引我的是以遵义花茂村脱贫攻坚和新农村建设为原型,讲述新时代干部群众携手精准扶贫奔小康故事的《花繁叶茂》。喜欢它不仅是因为该剧用小切口大立意,有趣又有梗,还因为我曾去过花茂村,那里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2018年,我随旅行团在苟坝会议旧址参观结束后,去到花茂村。村庄不大,一栋栋新建的楼房沿着平整的道路往前延伸,虽是旅游淡季,小村庄也不冷清,农家乐里人山人海,走进生意最好的一家农家乐,小院里建有池塘、亭台,院外是望不到边的青青稻田,老板脸上堆满了笑容。后来听导游介绍,知道小院大有来头: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到花茂村视察扶贫工作,曾在这家人的小院里与村民亲切交谈。临走时,我特意到村民开的陶器店和古法造纸店买了一对小鹿摆件和一刀宣纸留作纪念。

电视剧《花繁叶茂》播出时,我明白,我当初看到并不是全部,这部剧让我更懂得是怎样一种力量,让贫困荒芜的“荒茅田”到花繁叶茂的花茂村。剧中,为了使乡亲们脱贫致富,枫香镇党委书记石小锋根据各村情况,决定在花茂村发展乡村旅游、红色旅游产业,在纸房村发展传统造纸业,在大地方村发展长效生态旅游农业项目。3年时间里,石晓峰带领唐万财、欧阳采薇等扶贫干部,尝尽了酸甜苦辣,与群众一起让花茂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纸房村和大地方村实现了脱贫。该剧没有追求宏大叙事,而是以一件件扎实、具体的小事,让“精准”二字的要义精准呈现。

脱贫攻坚取得圆满收官,离不开扶贫干部和贫困群众的共同努力。花茂村村支书唐万财让人印象深刻,他是个浑身“土腥味”的基层村干部,主意不少,常常闹笑话,工作也不太严谨,但他对扶贫事业充满热忱。在妻子实在受不了穷而跟他离婚时,他也曾想过离开,可孩子把作为口粮的红薯省下来交学费,哭着求老师留下来的时候,他决定留下来。在“小人物”唐万财身上,我们能看到许多扶贫干部和基层村干部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力量书写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剧中“政策热词”不少,旅游扶贫、电商扶贫、养殖扶贫、农村“三改”、土地流转、移民搬迁、产业改造升级等名词,从中我们看到扶贫手段的多元。正是因为有党中央的领导,各地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开展扶贫工作等原因,我国才实现了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追完整部电视剧后,我给当初跟团参观花茂村的导游发了微信:我想再去花茂村。导游很快给我回了微信:欢迎您来,花茂村更美了,你来了会有新发现和惊喜。



图片来自网络